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 ——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

张爱琴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三期重点建设项目
“乡土教材收藏与乡土知识传承研究”项目编号：MUC98507-050201

香港乐施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
项目资助号：CNG-94697-01-0709A-K

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

——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

张爱琴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
田野调查/张爱琴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1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滕星主编.第4辑)

ISBN 978-7-105-12635-4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乡土教材—研究—宁夏
IV. ①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813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欧泽

封面设计: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430千字

印张:15.5

定价:45.00元

ISBN 978-7-105-12635-4/G·1860(汉88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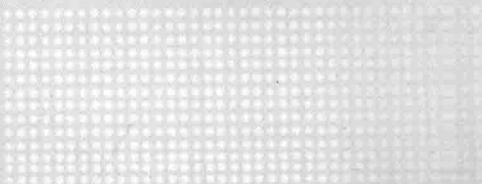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47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教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

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

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

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偌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现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

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在完成“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从2012年夏开始，“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四辑（第一批）8部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分别是：《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论文集》（滕星主编）、《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班红娟著）、《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张爱琴著）、《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杨红著）、《台湾乡土教育历史与模式研究》（吴杰著）、《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研究》（韦美日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星

2012年5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前 言

全球化、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美国化，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但要向世界看齐，与时俱进，还要立足自身的实际，即我们通常所指的国情。与此相对应，一个国家的学校教育应该在传授国际性知识、普世知识的同时，关注本土知识、地方性知识。

在学校教育中，教材是知识的主要载体之一。但是，受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我国现行学校教育过分强调国家统编教材的地位和作用，忽视了乡土教材的功能和作用，导致乡土教材“边缘化”。

事实上，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传播、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学校教育学习主流文化，有利于培养个体在主流社会中的文化适应能力；但对主流文化正向功能的强调，并不是要排斥乡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承主流文化，还要关注乡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让学生全面了解自己的家乡、民族和国家，增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学生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便在于此。

本研究以功能主义为理论范式，主要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个案对象，采用整体研究与专门研究相结合、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对宁夏乡土教材进行搜集、调查和文本分析，在梳理宁夏乡土教材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从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团结教育两个角度出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田野点进行深度调研，审视宁夏回族自治区乡土教材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成因与功能，反思其对于教师、学生、校园文化及社区发展的功能。以期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乡土教材的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透视宏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结构，为乡土教材的发展寻找更为广阔的时空；让民族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多一个教育选择的机会；为创建民族间沟通与交流平台提供思考的视角；促进学校教育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探索传承与创新回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

调查发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无论对个体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个体发展角度来讲，民族地区乡土教材有利于民族地区学生民族认同感、地域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和培养；有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学生适应乡土社会的能力，提供谋生的机会和技能；也有利于民族地区教师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反思实践能力的提升。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民族地区乡土教材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选择、交流和创新；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民族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乡土教材以自身独特的功能而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但是，受价值取向、社会制度、主体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乡土教材的这些非常重要的正向功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出现了功能隐性化、微弱化的问题，乡土教材的生存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并诱发了一些负向功能。当然，与乡土教材的正向功能相比，乡土教材的负向功能非常微弱，是可以调节、控制和转化的。

乡土教材既要“以学生发展为本”，又要立足乡土社会。这是

本研究对乡土教材的价值定位。只有与学校教育目标相一致，乡土教材才有可能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得以生存；只有从乡土实际出发，乡土教材才能在乡土社会中立足。因此，乡土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功能有共性，也有差异，二者关系是共性与个性在教材领域的具体体现。如乡土教材和统编教材都以培养人为本体功能，乡土教材更注重对地方社会人才的培养，服务于地方社会的发展，而统编教材体现的是社会对人才规格的统一要求，服务于整体；乡土教材和统编教材都具有文化遗产的功能，但乡土教材传承的文化内容是乡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非主流文化，而统编教材主要传承的是主流文化。

可见，乡土教材与统编教材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乡土教材不能完全代替统编教材，统编教材也不能完全代替乡土教材。从教育总体功能和目标的实现上来看，乡土教材以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教育的功能和目标，并不逊色于统编教材，因此，不应将乡土教材边缘化，而应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等方面给予乡土教材应有的地位和生存空间。

在对田野调查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应从理论、制度和实践等角度全面、系统、有层次、有重点地建设乡土教育体系；完善乡土教材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评价体制；形成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生态链，促进大中小学之间的合作，实现乡土教材功能最大化、最优化。

本书分四个部分，共六章。

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和背景、相关研究动态和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理论范式等，以明确研究的基础、思路，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即第一编“历史与现状”，包括第一章。该部分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采用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乡土教材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一章

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历史、地理、文化、回族教育进行介绍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宁夏乡土教材变迁的历史，从历时性角度对宁夏乡土教材的社会功能与个人功能、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等进行描述，对宁夏乡土教材做“面”的概述。

第三部分即第二编“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一部分以开发目的和价值取向为参照标准，从“点”上对基于民族团结教育的乡土教材开发模式和基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乡土教材开发模式进行深入地田野工作和文本分析，探讨不同开发模式下乡土教材功能的表现形式和属性。其中，第二章“基于民族团结教育的乡土教材开发模式”主要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编写的《民族政策常识》地方教材为研究对象，回顾了该乡土教材 25 年的生命历程，进而探讨国家制度与地方文化、乡土教材生存空间与乡土教材功能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基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乡土教材开发模式”选择项目推动下的宁夏回族“花儿”乡土教材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校本乡土教材《回族查拳》为个案对象，展现了社会结构对乡土教材的制约性，同时也生动地再现了乡土教材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第四部分即第三编“理论分析”，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对前三章宁夏乡土教材田野调查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将其提升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功能分析的理论高度。其中，第四章主要是从生态环境、教育体制、开发主体、乡土教材自身结构等方面分析影响和制约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功能发挥的因素；第五章主要从社会与个体、正向与负向等维度分析了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功能；第六章主要从理论体系建设、体制完善、生态链建设等方面提出提高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功能有效性的意见和建议。

目 录

导 论	(1)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背景	(1)
二、相关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3)
三、核心概念界定	(10)
四、研究采用的理论范式	(19)
五、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及处理方式	(29)

第一编 历史与现状

第一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土教材地理、历史、 文化考察	(33)
第一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 文化变迁	(33)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地理环境	(33)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历史变迁	(35)
第二节 宁夏回族教育发展概述	(37)
一、宁夏回族教育取得的成绩	(37)
二、宁夏回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的问题	(40)
第三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土教材的 历史变迁	(43)